

关于朝鲜前期景福宫建筑 样式和意义的研究

[韩] 李康根

内容提要 朝鲜时代前期不仅是政权的交替期，也是统治阶层主导思想从佛教到儒教的过渡期。这个时期，儒家官人势力不仅推动了政治和主导思想的变化，还将儒家的天命观、自然观等理念加以理论化的图形化后应用到建筑布局中，使景福宫的建筑布局蕴藏了《周礼》的内涵。本文即以朝鲜时代新建景福宫的建筑布局、勤政殿月台栏杆的石兽分布以及文昭殿的布局形式为讨论核心，对朝鲜时代前期宫阙和原庙的建筑形式的形成过程所包含的文化史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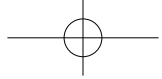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关键词 景福宫 图说 阴阳五行 四神 十二支像

一 绪论

朝鲜时代前半期建造的建筑中，一直留存至今的例子并不多见，即便是在长期作为朝鲜王朝都城的汉阳，也只有崇礼门而已，其他各地方行政中心所建的官衙或香桥都不是朝鲜时期留存下来的建筑，只有建在山上的部分佛教寺院得以留存。通过对这些寺院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木造建筑的结构、装饰、功能以及空间结构等。

但可惜的是，留存至今的佛教建筑数量也并不多，只有庆尚北道安东凤停寺大雄殿、全罗南道康津无为寺极乐殿、忠清南道瑞山开心寺大雄殿、洪城高山寺大雄殿以及江原道平昌五台山中台寂灭宝宫等。而相关文献记录也只有在实地调查中得以确认的上梁墨书而已，并没有其他相关的寺中记或官撰史书等资料。因此，要想研究朝鲜前期建筑与高丽末期和朝鲜后期建筑的关系和样式变化，仅仅依靠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而要想深入探讨大雄殿与极乐殿风格的差异，或是该时期各寺庙所依经典中蕴含的佛教美术内涵，更是不可能之事。

那么，若要研究朝鲜前期的建筑样式和意义，我们该从什么样的建筑入手呢？如果是研究佛教建筑，我们可以结合宗派或信仰内容来分析伽蓝的分布和殿阁结构，但即使如此，要从现存的伽蓝资料中提取朝鲜前期建筑的形成过程或各发展阶段的资料也并非易事，虽然也有个别寺院可以成为很好的研究对象。例如京畿道扬州桧岩寺址，建于朝鲜前期，后来因战争而被掩埋，在朝鲜后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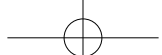


并未得到修复，而在最近的发掘调查中其伽蓝全貌得以呈现，同时还有关于该寺庙的文献资料作依据，如李穡《牧隐集》等，所以可以成为很好的研究对象。又如朝鲜前期由王室主导新建或重建的首尔真观寺、江原道五台山上院寺、京畿道正因寺、京畿道奉先寺等，有权近和金守温的记文可作为相关参考资料。通过这些资料，不仅可以对伽蓝的布局和殿阁结构进行分析探讨，而且这些寺庙都具备举行国幸水陆斋仪式的设施，因此虽然他们并非当时的建筑原型，但却可以找出朝鲜前期寺庙建筑的共同点，而且还可以对水陆斋仪式所蕴涵的宗教意义与伽蓝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可惜的是，除了几个寺庙外，我们很难具体把握伽蓝内愿堂的位置和分布格局，即便他们曾是王室的愿刹。

基于以上原因，本论文将把寺院建筑列在研究范围之外，仅以朝鲜时代前半期的景福宫为中心，就佛儒教交替期的思想如何体现在建筑形式上进行分析探讨。宫阙、原庙、真殿等王室建筑的资料不仅可在实录和地理志中查到，而且在五礼仪等礼书的图说中也有记载，因此要了解其建筑形式和其中的含义则要相对简单。

景福宫虽然没有图说资料留存，但因为实录上有相关的新建期记录，所以不仅可以以此为依据画出当时的分布图，同时，学者郑道传也留下许多关于殿阁命名及其含义的文献资料，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资料来把握其分布形式的原理和意义。不仅如此，权近所著《入学图说》还将古典著作中所蕴涵的思想用平面图的形式展开说明，用视觉的方式告诉我们，王权政治思想在儒家眼中是如何体现在宫阙建筑上的。开京满月台的高丽正宫体现了佛教思想且包含信仰的内涵，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汉阳的朝鲜正宫景福宫却体现了中国古籍中的儒家王权理想。另外，景福宫的正殿勤政殿月台台阶两侧刻有石兽，栏杆柱子上依照方位刻了四神像和十二支像，而在过去，四神像仅仅出现在高句丽石墓室内四壁，十二支像则刻在新罗王陵护石和佛塔基坛上。那么在朝鲜时期，宫殿栏杆上为什么要刻四神像和十二支像呢？这些像为何能够出现在象征王权的空间里呢？

此外，景福宫东北部的文昭殿是世宗为了将太祖真殿文昭殿(昌德宫北部)与太宗原庙广孝殿合并，以便在同一处合祀而在景福宫内修建的殿阁，最初的修建目的便是为了统合宫阙外的两个真殿，于是便以高丽王宫内部的景灵殿为模型修建。高丽景灵殿是供奉太祖与直系四祖御真的真殿，有五个龕室，前方有拜殿，而与景灵殿不同的是，文昭殿则像《国朝五礼序例》中的“文昭殿图”一样，修建成前庙后寝的形式。在研究佛教与儒教过渡时期的复杂形式是如何体现在朝鲜前期建筑形式上时，文昭殿也是重要资料之一。



二 景福宫的布局与意义

（一）新建景福宫的布局与殿阁结构

本文对景福宫修建当时布局的分析探讨主要是以推测分布图〔图一：1、2、3〕为依据^①，这些图是学者根据朝鲜王朝实录绘制的，《太祖实录》太祖四年（1395）九月二十九日的记录详细记述了景福宫修建时的规模和布局，以及各建筑的功能^②。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得知，燕寝、东小寝、西小寝、报平厅等内殿建筑与正殿、东西角楼、东西楼库等都用行廊围起来，或是用穿廊连接起来。此外，正殿前南行廊上有殿门，前方有午门（南门，景福宫坐向为壬坐丙向），午门两侧有月华门（西门）和日华门（东门）〔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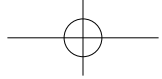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以上资料不仅对正殿、偏殿（报平厅）、寝殿（燕寝、东小寝、西小寝）等城廓的建筑规模（但是仅记录了正面间数）进行了详细记述，而且对正殿夹层基坛（上、下层越台）的宽度和高度，以及宫殿朝廷的宽度等也有详细记录，许多学者依据这些资料绘制出了推测图。但正如前面所提，上面的资料中，仅仅记录了建筑和行廊的正面间数，对于侧面间数则没有说明，对各间房屋的大小也未提及，同时也让人无法明确何处为穿廊。这些不足导致推测图的精确度受到影响。

同时，除了正殿、偏殿、寝殿这些核心部分以外，关于宫内其他设施的规模、位置、功能等的资料均无法查阅到，记录仅提到厨房、灯烛引者房、尚衣院、两殿司饔房、尚书司、承旨房、内侍茶房等辅助宫廷生活的设施与敬兴府、中枢府、三军府、东西楼库等加起来一共有390余间，城墙是后来建筑的，东门、西门、南门的名称分别为建春、迎秋、光化^③。光化门规格为三间，高两层，城门悬挂钟和鼓，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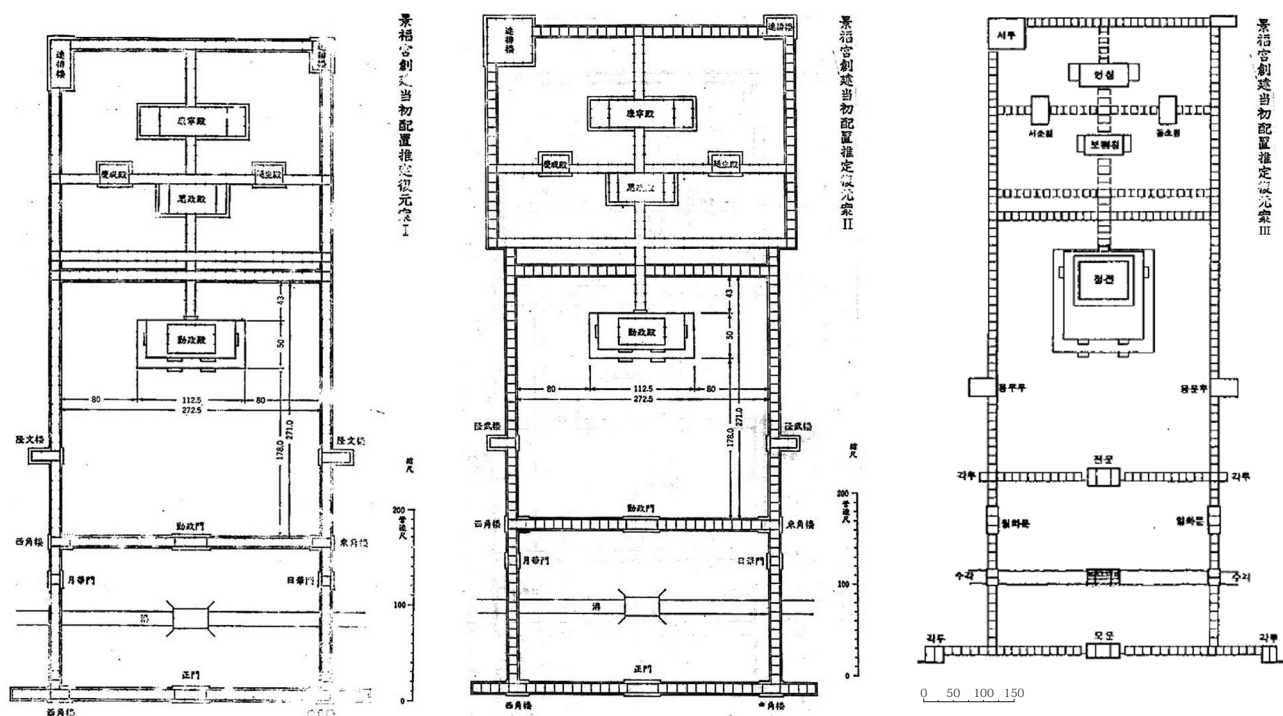
① 参考〔日〕杉山信三：《韩国の中世建筑》的两幅图（图1—1，图1—2），东京：相模书房，1984年；〔韩〕金东旭：《朝鲜初期修建景福宫的空间结构与高丽宫阙的关系》（图1—3），《建筑历史研究》第15辑，1998年6月。

② 《太祖实录》太祖四年（1395）九月二十九日（庚申）：“新宫燕寝七间，东西耳房各二间，北穿廊七间，北行廊二十五间，东隅有连排三间，西隅有连排楼五间，南穿廊五间。东小寝三间，穿廊七间，接于燕寝之南穿廊；又穿廊五间，接于燕寝之东行廊；西小寝三间，穿廊七间，接于燕寝之南穿廊；又穿廊五间，接于燕寝之西行廊。报平厅五间，视事之所在。燕寝之南，东、西耳房各一间，南穿廊七间，东穿廊十五间，始自南穿廊第五间，接于东行廊。西穿廊十五间，亦起南穿廊第五间，接于西行廊。自燕寝北行廊东隅，止于正殿北行廊之东隅，二十三间为东行廊，自西楼止。正殿北行廊之西隅，二十间为西行廊。以上为内殿。正殿五间，受朝之所，在报平厅之南，有上下层越台，入深五十尺，广一百十二尺五寸。东西北阶，广各十五尺，上层阶高四尺，石桥五级；中阶四面，广各十五尺；下层阶高四尺，石桥五级。北行廊二十九间穿廊五间，起自北行廊接于正殿之北，水刺间四间，东楼三间，有上下层。其北行廊十九间接于正殿之北行廊东隅，与内东廊连；其南九间接于正殿之北行廊西隅，与内西廊连，其南九间接于殿门之西角楼。殿庭广东西各八十尺、南一百七十八尺、北四十三尺。殿门三间，在殿之南，左右行廊各十一间，东西角楼各二间。午门三间，在殿门之南，东西行廊各十七间，水阁三间。庭中有石桥、御沟，水所流处也。门之左右行廊各十七间，东西角楼各二间。东门曰日华，西门曰月华。其与厨房、灯烛引者房、尚衣院、两殿司饔房、尚书司、承旨房、内侍茶房、敬兴府、中枢府、三军府、东西楼库之类，总三百九十余间也。后筑城墙，东门曰建春，西曰迎秋，南曰光化，门楼三间，有上下层，楼上悬钟鼓以限晨夕警中严。门南左右，分列议政府、三军府、六曹、司宪府等各司公廨。”（按，间隔为编者所改动）

③ 这里只是提及后来修建了城墙以及东西南三门的名称，但并未提及具体的时间，此记录时间为世宗八年十月丙戌日（参考《世宗实录》该日期的记录），由此可推断，最初修建城墙的时间为太祖七年，但给城门命名的时间应该是修建完工30年之后。



〔图一〕新建景福宫推测分布图



要是起到告知人们清晨和夜晚的作用，光化门南部有议政府、三军府、六曹、司宪府等各司官厅。

（二）中心城廓的布局形式与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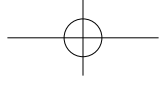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1. 布局形式

首先从推测分布图来看，宫殿由回廊围起，由三个中庭组成，南北中心轴(壬坐丙向)上前后分布着正门、锦川桥、勤政门、勤政殿、思政殿、康宁殿等，最前方的正门与勤政门之间的中庭有锦川桥，勤政门与北行廊之间的中庭则有正殿勤政殿，最后的中庭则被划为内殿的报平殿(思政殿)和寝殿(燕寝康宁殿与东西小寝延生殿和庆成殿)等。

那么这种前后中庭延续分布的形式的起源又是什么呢？郑道传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其起源，但其给宫阙和宫殿的命名都是借用了中国古籍中的含义，而且从以《周礼》“六官制”为基础而著述的《朝鲜经国典》来看，这与《周礼·考工记》“匠人”的宫城规划中三门与前朝后寝的规制有一定联系。这里的三门指的是庙门、应门和路门，庙门内部大廷称为外朝，左右两侧的宗庙和司职并列组成城墙



〔图二〕《中庙朝书筵官赐宴图》



外的宫殿区。应门内为内朝，路门内为寝宫，内朝和寝宫组成宫城区，和宫殿区合在一起便形成宫廷区整体。路门“位于内部，为居住之处”，应门“位于外部，为朝会之地”，从这些表述方式来看，朝会称为“朝”，居住称为“寝”，这应该就是在对前朝后寝的制度进行说明^{〔1〕}。

那么，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解析景福宫修建时的布局形式，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从前面引用的九月二十九日的记录我们可以得知，景福宫由内殿、正殿、寝殿、城墙，以及城墙南部五个部分组成。这里的燕寝和东西小寝相当于《周礼》中的“寝”，而接受朝会的正殿则与《周礼》的“朝”相当，即应和了前朝后寝的布局形式。但记录并没有提及连接寝殿区域的路门，也没有将时事之所报平殿列入正殿区域，而是将其划为内殿区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们很难说景福宫的内殿区域完全与《周礼》的“朝”与“寝”相对应^{〔2〕}。

同时，正殿南部殿门的南向还有一个午门，对于殿门与午门之间的中庭是否应该划入治朝领域，记录并没有明确说明，不过从将应门定义为城墙区正门这点来看，午门即为应门，而午门至正殿北行廊的空间则可以划为治朝区域，正殿北行廊至燕寝北行廊为燕朝区域，因此，我们虽然可以以《周礼》“匠人营国”条中的王城规划原理为基础来解析修建景福宫的布局形式，但景福宫的布局形式也有其自身明显的特点。

但景福宫修建后不久，午门外城墙外围便有了东门、西门和南门，城墙南门外有议政府、三军府、六曹、司宪府等官厅分布。贺业钜将城墙区外大廷看作外朝，他认为这里是举行宗庙仪式的场所之一，也是处理狱事和讼事以及颁布法令的地方，同时还是朝士执法的地方。根据他的意见，景福宫外朝应为城墙南门之外区域，那么这种情况下，城墙内午门外的诸多官舍又该如何划分呢？如果从区域上看，它们位于城墙内，应称为治朝，但从功能上看，它们属于官厅，因此应该划为外朝，贺业钜参考了《周礼》的规定，并结合“匠人”的规划蓝图绘制了“城墙规划想象图”，其中，中心城廓左右分布着“匠人营国”条中并未言及的官府次舍，可为我们提供参考〔图三〕^{〔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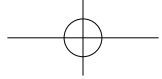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在上面的九月二十九日的记录中，并未出现燕朝、治朝、外朝、庙门、应门以及路门等用语，因此我们不能将《周礼》的宫阙分布信息完全套用在景福宫上^{〔4〕}，但也不能说朝鲜开国势力对古代宫阙的

〔1〕 对于《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分析部分参考了以下著述，贺业钜(Un Jung-sook译)：《中国都城制度理论——周礼考工记的都城制度》页111—131，首尔：以会文化社，19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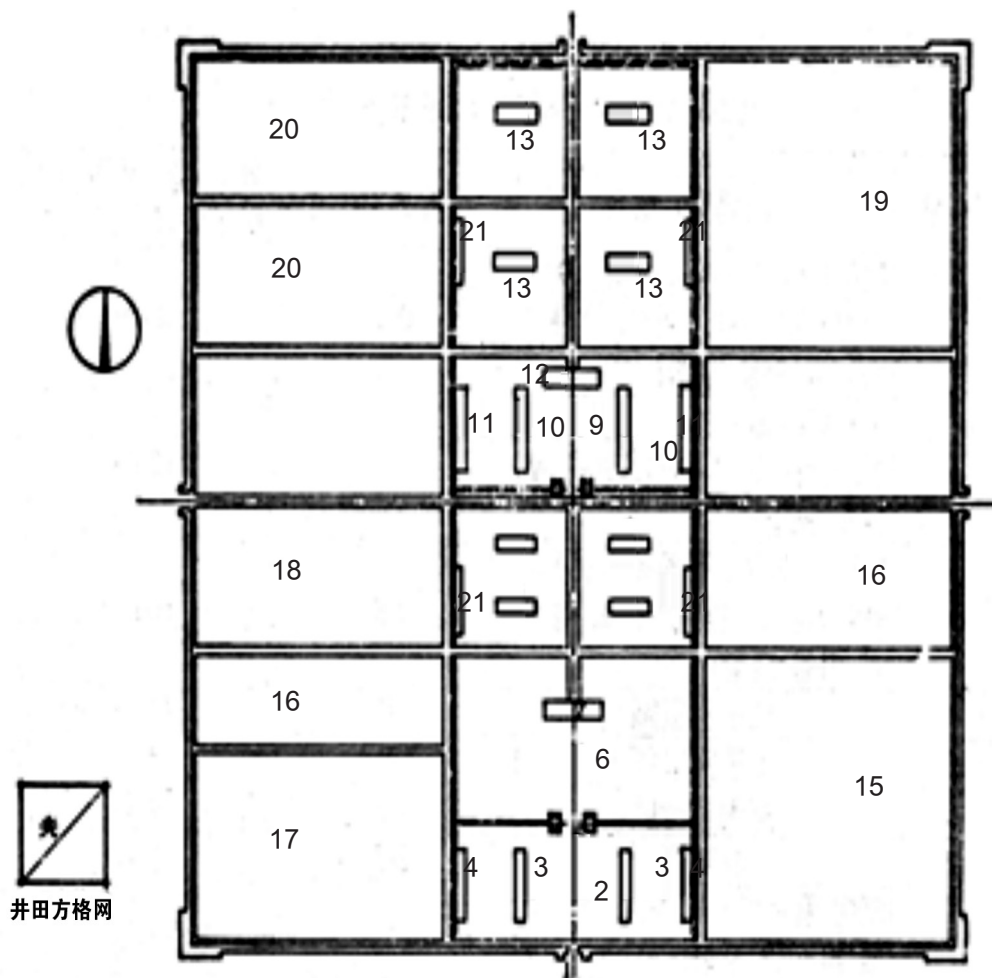
〔2〕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参考了以下文献，该研究认为“宫阙是为了举行各种典礼和仪式以及服务日常生活的地方”。Cho Jae—Mo·Kyoung Se—Jin：《透过阖门看朝鲜时期宫阙的内外概念》，《韩国建筑历史学会春季学术大会发表论文集》，2010年5月；Cho Jae—Mo：《朝鲜时期宫阙的仪式举行与建筑样式》，首尔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3〕 《中国都城制度理论·周礼考工记的都城制度》页135—150，著者在《周礼》“冬官考工记”的“匠人营国”条中并未提及朝寝以外的官府次舍，在《周礼》通篇中用“官府”与“舍”来指称常住宫中的职官的办公之处，而不常住宫中的人员使用的地方则叫做“次”。

〔4〕 对于用“三门三朝”来解释修建景福宫的布局形式会产生问题，本文参考了以下文献，金东旭：《对景福宫建筑布局的“三门三朝”之说产生的疑问》，《建筑历史研究》，2001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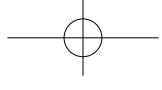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图三] 基于周礼的城墙规划想象图 《中国都城制度理论》页150
1.应门 2.治朝 3.九卿九室 4.宫正·宫伯 官舍 5.路门 6.燕朝 7.路寝 8.王燕寝 9.北宫之朝 10.九嫔九室 11.女祝·女史 官舍 12.后正寝
13.后小寝 14.世子宫 15.王子宫区 16.官舍区 17.府库区 18.膳房区 19.典妇工 作坊区 20.内司服·缝人·履人 作坊区 21.服饰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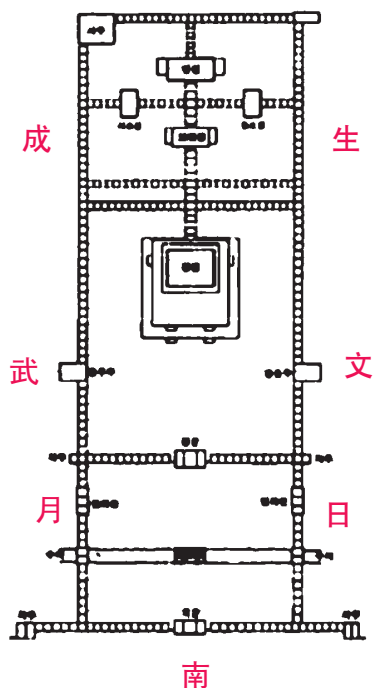
看法完全与《周礼》的王城规划无关。作为一种理想的规范制度，周制在中国历代政权建筑宫阙时都被参考，只不过各时代宫阙的实际建置会根据王权和实际情况而有所不同，因此朝鲜时代初期的景福宫也会根据政权和官僚机构的情况而设计。而在王权得以巩固之前，景福宫是为了适应儒臣所追求的以宰相为中心的政治体制而修建的。

2. 定名与象征形式

另外，给宫殿建筑命名的时间是在为了纪念定都并庆祝新宫殿竣工而在宫阙内举办宴会之时，当时，郑道传奉君王之命给宫、殿、楼、门等命名，他说，“宫阙为君王处理国政之地，也是万人景仰之地，臣民均在此出入，因此宫殿要有庄严的制度和风格，名字也要尽显优雅之意，让听者印象深刻，为之感动”，于是便给宫命名景福(出自《诗经·大雅篇》)，燕寝名为康宁(典出《书经·洪范篇》)，东小寝为延生，西小寝为庆成(象征天地运行与万物生长的顺序)，偏殿报平厅名为思政(典自《诗经》、《书经》)，正殿与其殿门名为勤政(语出《书经》)，东西阁楼分别名为隆文和隆武(文武兼



〔图四〕新建景福宫的布局形式和意义



备)，午门则为正门(天子朝南能成就大业之意)^{〔1〕}。

那么，我们现在就根据建筑物名称的含义来探讨景福宫的布局原理，我们可以发现，正殿东西两侧的建筑对称，其名称包含文武、日月、生成之意，这也体现了儒教中的理念，认为一切均应顺应自然法则和秩序，同时也包含了崇尚文武之意〔图四〕。这种儒教思想也体现在汉城都城的四大门和位于中央的钟阁的命名中，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与东西南北中的五行方位相对应。

儒教政治理念本身便是以圣君的理想统治为目标，而儒教经典则是精心整理了这些理念，图说则是为了让人们更加容易掌握经典内容而加以图解和说明，但这幅图说的样子与建筑群的布局图十分相似，朝鲜初期大学者权近(1352~1409)在《入学图说》中将君王要想成就大业必须要具备的素质和统治天下的法则用“洪范九畴天人合一图”〔图五：1、2〕来说明^{〔2〕}。另外，“天人心性合一之图”〔图六〕则是根据“太极图”与“中庸章句”而描绘了由阴阳五行组成的万物与人类心性合一的景致。

上面两幅图均收录在儒学教育的入门书中，因为这有助于人们了解儒臣的思维方式。即，通过图说的方式，儒臣们能从左右对称的几何构图中熟悉儒学的基本理念，而他们将要把这些理念应用到宫阙建筑的布局或建筑的命名之中也并非难事。

由此可见，修建景福宫处处都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念。而景福宫修建后，宫内的勤政殿、内殿、宾殿等都举行过各种佛教活动^{〔3〕}，后来还在原庙中设立了内佛堂^{〔4〕}，并且，一直到世宗八年以前，勤政殿御座上都有真言装饰^{〔5〕}，这些都体现了佛儒教交替期宫阙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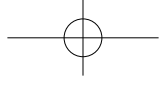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1〕 参考《太祖实录》，太祖四年十月七日丁酉条与《国译三峯集2》，页256—261。

〔2〕 《太祖实录》太祖卷一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壬寅)，花山君权近上书：“(中间部分省略)皇考桓王定陵之碑文由微臣与郑摠一同奉命所写，开国功臣教科书之文也是微臣所修正，郊社、宗庙之乐章与定都、宫阙管理之文簿，也是微臣编撰和挑选，虽然其文采稍显粗糙，但开国一事，其自身之美便足以流芳百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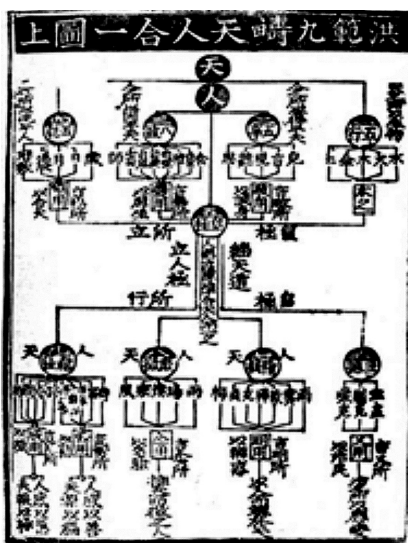
〔3〕 关于佛事活动的记载在朝鲜国王的实录都可以找到，如《太祖实录》太祖五年四月丙辰，五年十月乙未，七年一月乙卯；《太宗实录》太宗八年六月癸巳，十三年五月甲辰；《定宗实录》定宗元年八月壬子；《世宗实录》世宗元年十月己丑。

〔4〕 《世宗实录》世宗三十年七月十七日、十二月五日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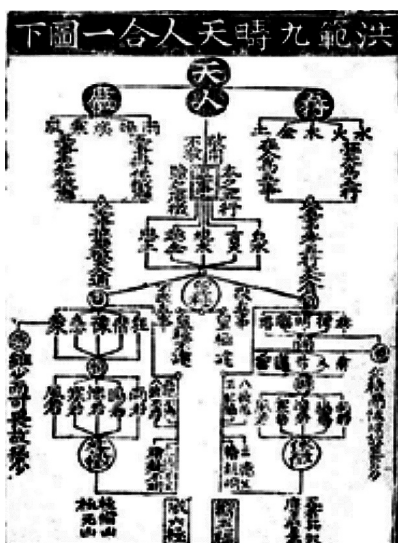
〔5〕 《世宗实录》世宗八年十月癸酉条。



〔图五-1〕洪范九畴天人合一图上 《人学图说》



〔图五-2〕洪范九畴天人合一图下 《人学图说》



〔图六〕天人心性合一之图上 《人学图说》



三 勤政殿城廓的布局形式与意义

（一）世宗时期各设施的完善

太宗住在昌德宫期间，其居所并未搬到景福宫，而世宗即位三年之后便常常移御到景福宫，除了对原来的宫殿加以修缮之外，还于世宗八年下令让集贤殿文臣为宫内的门和桥命名，这时定下的门有弘礼门(勤政门前第二道门)、光化门(勤政门前第三道门)、日华门(勤政殿东廊夹门)、月华门(勤政殿西廊夹门)、建春门(城墙东门)、迎秋门(城墙西门)等，而建于锦川的桥则命名为永济桥^{〔1〕}。

景福宫城墙的最初修建时间为太祖七年(1398)^{〔2〕}，30余年之后世宗时期对城墙进行了修缮^{〔3〕}，并给南、东、西三个方向的城门命名，正门的名称也由午门改为弘礼门，于是，原来只由宫殿和行廊组成的景福宫也由此时开始具备了城墙和阙门，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宫阙。世宗九年(1427)，外廓也修建完毕，至此，景福宫的规模基本固定，并逐渐在宫内新增或维修各项设施，使之逐渐具备了完善的法宫体制^{〔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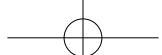
1426年(世宗八年)修缮勤政殿，1427年新建东宫，1428年修补建春门，1429年重建庆会楼和

〔1〕 《世宗实录》世宗八年十月丙戌。

〔2〕 《太祖实录》太祖七年七月庚子，另外《定宗实录》定宗元年(1399)一月庚寅记录显示城墙和外城均为新建。

〔3〕 《世宗实录》世宗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景福宫城墙的东西两侧原本有十字阁，但阁楼开始倾斜，于是君王以此阁楼无用为由下令废除。

〔4〕 对于世宗时期景福宫修缮的意义，参考以下研究，金东旭：《世宗在朝鲜初期景福宫修缮中所起的作用》，《建筑历史研究》页129—142。



思政殿。1433年修补康宁殿并新建了城墙北门神武门，至此，城墙四门都已完工⁴¹。同年还在城墙西北一隅修建了天文观测所简仪台。1434年4月弘礼门外的东西廊成为议政府六曹与各司入值和待朝之处，另外，这一年8月还新建了报漏阁并对隆文楼和隆武楼进行修补。1435年9月在宫内设立了铸字所。1438年在康宁殿西侧修建了钦敬阁，在建筑内部设立了仪象，这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之一⁴²。1443年，宫内成立了谚文厅并创制了韩文。

1432年11月，为了将广孝殿和文昭殿合祀，按照五间的规模修建了新的建筑⁴³，1438年3月将原来位于宗簿寺附近的璿源殿搬迁到文昭殿东北部⁴⁴。另外，1443年在后宫区域修建了交泰殿，这也扩大了后宫的领域，该年4月还在宫内新建了尚书司与春秋馆，5月给各门命名⁴⁵。1449年6月正宫内有了康宁殿、延生殿、庆成殿、思政殿、万春殿、千秋殿等，后宫内则有含元殿、交泰殿、紫薇堂、趾堂、宗会堂、松柏堂，以及清燕楼等小室⁴⁶。其中，万春殿与千秋殿位于偏殿思政殿的左右两侧，是为了辅佐思政殿而新建的小便殿，而在初建景福宫时将思政殿建于离寝殿区域较近的地方，由小寝殿延生殿与庆成殿起辅佐功能，万春殿与千秋殿的分布是由这种布局形式变化而来的。因此，到了世宗时期，寝殿区域与偏殿区域之间的区分已变得明显，虽然没有现存资料能向我们展示当时的情景，但从英祖四十三年(1767)之后所绘制的分布图来看，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世宗时期的法宫分布形式。

（二）勤政殿月台栏杆石兽的分布形式与意义

1. 钦敬阁内部自击漏的形式与意义

世宗十四年(1432)开始制造简仪，六年之后成功制造出大小简仪、浑仪、浑象、仰釜日晷、日星定时仪、自击漏等大部分仪象，这所有的仪器都设在景福宫的后院，据说君王在视察时指出存在的缺点，下令先做出模型，再利用水的力量，使其自动运作。金墩(1385~1440)所著的“钦敬阁记”的序文中，对修建钦敬阁的来历和仪器自动运作的意义进行了以下阐述。

在千秋殿西庭院建一间小阁，糊纸为山，高七尺许，置于其中，内设玉漏机轮，以水

〈1〉 《世宗实录》世宗十五年七月丙子，有上书称帝王的城墙一定要有四大门，于是决定新建北门，但北门的名称(由徐居正命名)到世祖六年(1475)八月二十三日才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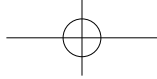
〈2〉 《世宗实录》，世宗二十年一月七日壬辰。

〈3〉 参考《东国輿地备考》第一卷，“京都篇苑囿条”，《国译新增东国輿地胜览》(1)，页201。

〈4〉 《世宗实录》，世宗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条，此时文昭殿已迁移至东北部。

〈5〉 议政府和礼曹上奏的新的门名为报楼门(月华门外)、迎义门(迎秋门内)、东明门(东直房之门)、西明门(黍稷房之门)等。

〈6〉 《明宗实录》，明宗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晴烟楼为三殿(王大妃·王大妃·王)合御之处，由于其过窄，为了避雨雪，君王下令至承政院让其修建月廊。



激之，用金为日，大如弹丸，五云绕之，行于山腰之上，一日一周，尽见山外，夜没山中，各随节气与天日合。

这段表述说明了该模型会随着太阳每日的转动以及节气变化而自动运作，这段场面描写也能让人想起勤政殿御座龙桌后摆放的日月五岳图。而接着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钦敬阁记”的末尾这样记述了该仪器的意义^①：

有了四神、十二神、鼓人、钟人、司辰、玉女等，所有机关均无需借助人力，仪器自动运作，仿佛有神助之，在视觉上，日晷和漏水的运作过程与天之转动无异，此外，山之四方根据“豳风”七月诗而造了四时之景，刻人物、鸟、禽兽、草木之形象，并依据气候和节气摆置，体现了民间农事之苦。

仪器依照气候和节气在山的四方造四时之景，并摆置了人物、动物、草木等雕刻，以便让君王了解百姓耕耘之苦。那么，这里四神的位置和作用又是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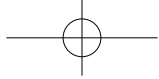
日下有四神，分别站在各自方位，均面对山，寅时一到，青龙面向北，卯时即面向东，辰时朝南，巳时再回归西向，朱雀再转向东，轮流朝向的方位均与前面所示的相同。

四神分别负责一天不同的时间，例如青龙则负责寅时、卯时、辰时，时刻一到便自动改变朝向，继青龙之后，朱雀则负责报巳时、午时、未时，自动朝向东、南、西。即，四神负责在东西南北方位告知人们一天的时间，那么十二支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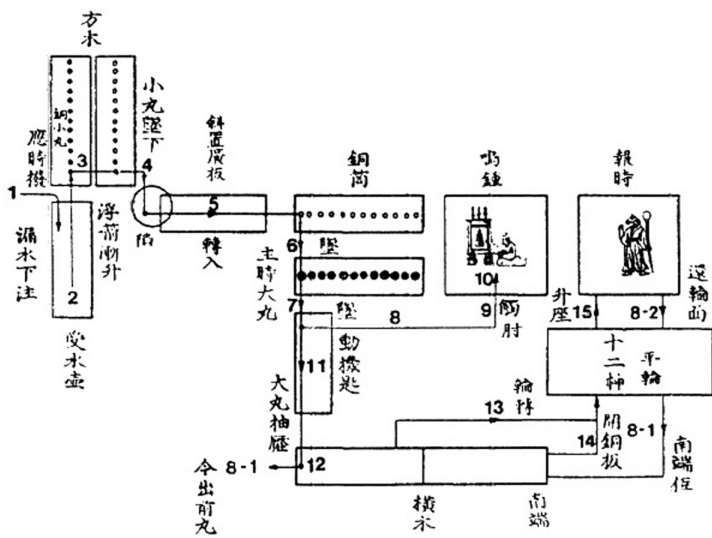
地面上，12个神将分别俯卧在所负责的方位，他们的后方均有小洞，这个小洞一直是关闭的，子时一到，鼠神后面的小洞就会自动打开，玉女拿着时牌走出，老鼠从前面站起，子时过后，玉女返回原位，神像后的小洞也会关闭，老鼠又回归俯卧状……每12个时刻均如此反复。

该报时器根据12个时刻将神将和玉女分别摆在不同的方位，他们根据时间的不同而自动做俯卧或站立的动作〔图七〕。作为一种自动报时器，自击漏以农村为背景，将太阳的转动和时间的流动用方位的方式告知人们，方便人们理解，同时，它也是能让君王在宫中常常想到百姓疾苦的视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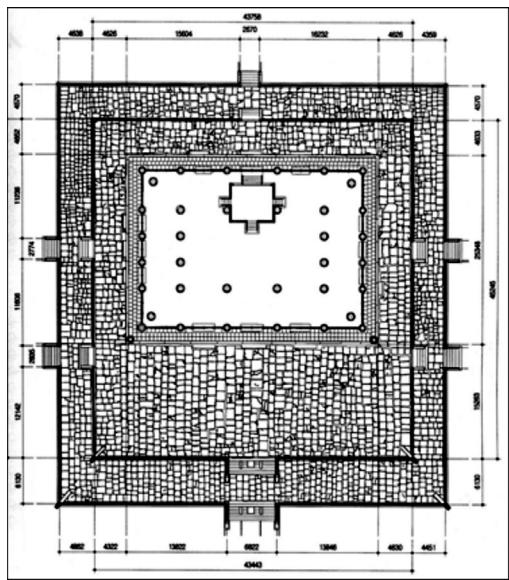
① 李肯翊：《纂述与制作》，载《燃藜室记述》第三卷“世宗祖故事本末”。在这本书中引用了金墩的《钦敬阁记》里内容。



〔图七〕钦敬阁自击漏报时器信号传输和运作顺序 南文弦:《关于世宗自击漏报时系统的研究》



〔图八〕勤政殿月台栏杆桥台的神像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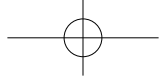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艺术品。勤政殿栏杆的四神像与十二支像也与自击漏有一定关联，在新建景福宫的记录中，并没有月台栏杆或石柱像的相关内容，因此，栏杆石柱像的制作时间很可能不是在新建宫殿的太祖时期，而是后来的世宗时期^{〔1〕}。

3. 勤政殿月台栏杆雕刻的象征形式

勤政殿与其他建筑呈回字型，各殿形成独立的区域，并成为维护王权权威与神圣的空间。复廊形式的回字型建筑中，南侧勤政门左右为月廊通道；东侧一层为官厅，二层为隆文楼和带仓库的东行阁；西一层为官厅，二层为隆武楼和带仓库的西行阁；北部为门朝思政殿的内帑库。其中隆文楼和隆武楼意指文武的隆盛，是辅佐君王处理政务的重要建筑。勤政殿则是处理政事的正殿，为两层建筑，建在高筑的双重月台上，这里值得关注之处便是月台石栏杆周围有石兽雕刻，这是该建筑的象征形式〔图八〕。即，栏杆桥台上排列的四神与十二支像雕刻分布在代表政权中心的正殿周围，象征着各神像随着时刻的不同而站立在不同方位，虽然这些雕刻不能像自击漏的神像那样会随着时间不同而做出俯卧或站立的动作，但却以固定的姿势正面凝视着正殿，向人们展现了自击漏神像中看不到的另一个景象^{〔2〕}。同时在视觉效果上也起到了启示君王的作用，提醒其应顺理明治天下，正如自击漏的设计应该顺应自然循环的秩序一样，这也可以证明儒家官人阶级的天命观在月台的设计上有所体现。

〔1〕 《太祖实录》太祖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庚申)记，“正殿五间，受朝之所，在报平厅之南。有上下层越台，入深五十尺，广一百一十二尺五寸。东西北阶广各十五尺。上层阶高四尺，石桥五级；中阶四面广各十五尺；下层阶高四尺，石桥五级”。

〔2〕 现在勤政殿月台栏杆的石兽雕刻在雕刻手法上并不完全相同，对此，有分析认为这些石兽雕像分别刻于朝鲜前期和末期(Cho Eun-jung:《小论19、20世纪宫廷雕刻》，《韩国近代美术史学会》第5期，1997年)，笔者认为最初雕刻的时间应为世宗时期。



四 结论

前面我们以新建景福宫的建筑布局、勤政殿月台栏杆的石兽分布以及文昭殿的布局形式三个例子为中心，对朝鲜时代前期宫阙和原庙的建筑形式的形成过程中所包含的文化史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朝鲜政权建立后，不仅在集权势力上发生了变化，在主导思想上也不同于之前的高丽时期，即由佛教过渡到儒教，主导思想上的过渡又影响了建筑风格，因此，高丽时期的宫阙建筑与原庙建筑反映的是佛教文化的一部分，而朝鲜时期的宫阙和原庙反映的则是儒教文化的一部分。

郑道传与权近等朝鲜初期的代表性集权势力排斥佛教，他们致力于整理儒教文化的精髓，并将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理念和图说以实现王权政治为主题应用到帝王统治的建筑象征——景福宫的布局上。世宗时期新造了日晷、水漏等各种天文和科学仪器，在此时期，自击漏也得以发明，自击漏当中有综合了方位和时间的四神像和十二支神像，这些像也出现在勤政殿月台栏杆的雕刻上，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治理天下也应该像时空的循环一样遵循一定秩序的天命观、自然观均体现在宫阙布局、勤政殿月台以及自击漏的设计上，在这些设计中我们已经看不到佛教的世界观。此外，朝鲜初期在宫阙正殿或内殿中也曾举行法会，但到了世宗四年，这些都遭禁止，而且原来刻在御座上的梵字文也被去除，在宫内已经感受不到崇尚佛教的氛围。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朝鲜时代前期的宫阙反映了政权和主导思想的过渡，而后逐渐发展为体现儒教文化的建筑。但是，景福宫的布局形式和意义的对应关系却很难在昌德宫中看见，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要回归佛教文化的意识并未完全消失，而影响建筑的主导势力，君王与集权官僚阶层的文化意识也未能完全摆脱高丽时期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冯晶晶译，吴映玟校）

[作者单位：首尔市大学建筑学部；
译者单位：高丽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宋仁桃）